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第九卷·2



世俗化思潮中的文学及文学批评

《域外小说集》重印考

主体的背面与断续

杨刚的英语自传与包贵思

吴宓与潘伯鹰交游考论

虚拟试验站

文化资本：民国时期戏剧教育的“场域”

熊佛西建设现代国民剧场的理念和实践

戏剧不死，还有精神

姚远剧作论

新世纪岛内有关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

“人性”的文学与“反共”文学的瓦解

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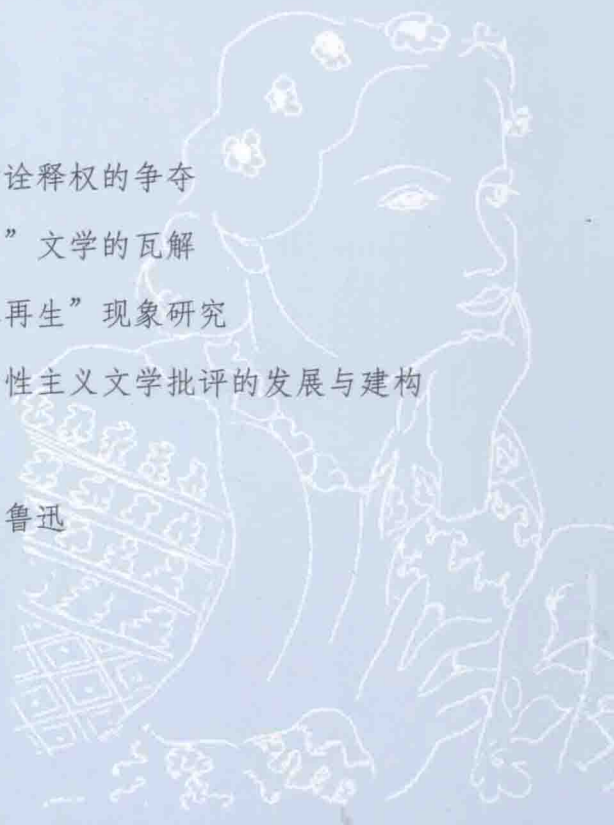
从《中外文学》看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与建构

田本相学术思想研究

“左联”与权力漩涡中的鲁迅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第九卷·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第9卷. 2 / 胡星亮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305 - 14790 - 6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029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九卷·2)

主 编 胡星亮

责任编辑 施 敏

责任校对 徐 超

封面设计 赵 秦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16 印张 13 字数 232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4790 - 6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董 健

副主任 丁 帆 温儒敏 陈思和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帆 王 尧 王中忱 王爱松 王彬彬

王富仁 朱晓进 刘 俊 杨 义 吴 俊

何锡章 陈平原 陈思和 张光芒 赵宪章

胡星亮 董 健 温儒敏

主 编 胡星亮

副主编 刘 俊 王爱松 张光芒

编辑部主任 张光芒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编辑部

通讯地址：南京市仙林大道 163 号(邮编 210023)

南京大学文学院 638 信箱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电 话：(025)89686720 89684444

传 真：(025)89686720

E-mail: zgxdwxlc@yahoo.com.cn

目 录

【现代论坛】

- 世俗化思潮中的文学及文学批评 陈国恩 等/1

【文学史透视】

- 《域外小说集》重印考 陈 洁/19
- 主体的背面与断续
- 重读《影的告别》 朱崇科/28
- 杨刚的英语自传与包贵思 倪婷婷/38
- 吴宓与潘伯鹰交游考论
- 以《吴宓日记》为中心 张元卿/51
- 虚拟试验站
- 论比目鱼的书评体小说 马 芸/62

【戏剧研究】

- 文化资本:民国时期戏剧教育的“场域”
- 一种戏剧人才培养的艺术性实践 胡志毅/75
- 熊佛西建设现代国民剧场的理念和实践 陈建军/86

【文学现场】

- 戏剧不死,还有精神 姚 远/95
姚远剧作论 谢 炜 陆 炜/104

【台港海外形声】

- 新世纪岛内有关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 古远清/130
“人性”的文学与“反共”文学的瓦解
——纪德“形象”与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文坛 陈秋慧/141
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研究 卢虹贝/151
从《中外文学》看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与建构 朱云霞/164

【学人研究】

- 田本相学术思想研究 杨景辉/175

【博士论文选粹】

- “左联”与权力漩涡中的鲁迅 蒙 雨/190

CONTENTS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Popularization Movement	Chen Guo'en, et al. /1
Corroborating the Reprinting of the <i>Collection of Foreign Stories</i>	Chen Jie/19
Back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Subject— Rereading <i>Shadow Bids Farewell</i>	Zhu Chongke/28
Grace M. Boynton and the English autobiography of Yang Gang	Ni Tingting/38
The Friendship between Wu Mi and Pan Boying—Corroborating Evidence in <i>Wu Mi's Diary</i>	Zhang Yuanqing/51
Virtual Experiment Station— On Bimuyu's Book Review/Novel	Ma Yun/62
Cultural Capital: The "Field" of Drama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Artistic Practice of Theatre Personnel Training	Hu Zhiyi/75
Constructing the Modern National Theatre: Xiong Foxi's Ideas and Practice	Chen Jianjun /86
Drama Is Not Dead Yet; It Still Has Its Soul	Yao Yuan/95
On Yao Yuan's Plays	Xie Wei and Lu Wei/104
On the Internal Struggle for the Right to Interpret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Gu Yuanqing/130

Literature of Humanity and the Breakdown of Anti-Communist Literature— The “Image” of André Gide and the Taiwanese Literary Circle of the 1950s	Chen Qiuhui/141
On “Textual Regeneration” in Mu Xin’s Literary Works ...	Lu Hongbei/151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in <i>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i>	Zhu Yunxia/164
On the Scholarship of Tian Benxiang	Yang Jinghui/175
Lu Xun in the Leftist Association and the Whirlpool of Power	Meng Yu/190

世俗化思潮中的文学及文学批评

陈国恩 等

陈国恩(主持人):世俗化思潮最早产生于西方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其特点是反对宗教神学的思想垄断,肯定人的合理欲望,高扬人的主体精神。严格地说,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神学,但中国的儒家思想长期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影响到社会的广泛层面,在维持了社会秩序和生活稳定的同时,也起到了限制人的思想自由乃至否定人的合理欲望的作用,这一负面影响到封建统治的晚期越加严重。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叛传统,就是中国现代世俗化运动的发端。不过,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世俗化思潮,是指新时期以后兴起、逐渐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以此前极“左”的政治思潮为历史背景的。由于针对着极“左”政治的否定人性、人情和人的合理欲望,这一股世俗化思潮同样具有人性解放的意义,其特点是要从极“左”政治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人性的丰富性,反对把人强制纳入机械的教条中,赋予人以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当然,这种主体性地位同时也要求人具有自尊、自强的精神,对历史和未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思想领域的这一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一转变最直接、最感性的形式,就是文学。

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开始,世俗化思潮在文学领域就开始显现。这首先是题材扩大到个人感情生活的领域,人的最隐秘的内心生活得到展现;其次,是其所依据的价值原则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评价正义和正当的标准与极左年代的以教条束缚人性的做法越来越拉开了距离;再次,人性在文学中得到越来越丰富多样的表现,人回归到了人自身。这给新时期的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呈现为一种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人道主义风景线。

但回归到人自身,有一个回归到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文革”刚刚过去那几年,人们所向往的是获得起码的尊重,具有人的尊严,但当这些要求随着社会进步而逐渐获得以后,关于人的想象或者说期待又开始发生了变化。变化的轨迹是从社会的人转

向个体的人,降低对人的公共期待,越来越贴近个人本位和人的内心欲望。这在文学领域呈现为解构崇高、削平意义的虚无主义倾向。出现这样的文学现象绝非偶然,而是与进入 90 年代后经济领域里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变化相为表里的。市场经济讲究利益原则,放逐了以前理想主义时代的宏大观念,花样翻新的成功典型又让人眼花缭乱,因而一些人的思想和感情陷于迷惑。迷惑,是寻找出路的契机;寻找的结果之一,就是一部分人更多地关注平凡人生乃至个人的享乐。反映这种世俗心态的文学,就是一种典型的世俗化文学,用这种世俗化时代的处世原则和价值理想来思考文学的问题,就构成了这个时期带有世俗化色彩的文学批评。很难对这样的世俗化文学和受世俗化思潮影响的文学批评做一个简单的评价,无论是世俗化的文学还是世俗化的文学批评,都曾起过推动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强化人的主体地位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必讳言,这一过程中发生过矫枉过正的问题,存在着以绝对个体的人对抗社会的人的倾向,造成了价值观的混乱。

评价世俗化的文学和受世俗化思潮影响的文学批评,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关系到对文学史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对未来中国的选择。这里发表的是一组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的笔谈,他们对世俗化时代的文学及文学批评发表了意见,各有侧重,并且有见地,我想可以作为大家进一步思考的参考,请识者批评。

(陈国恩,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学世俗化的功与过

晓 苏

追根溯源,那些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新思潮基本上都发源于西方。世俗化思潮当然也不例外。这股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风靡于我国的文化思潮,似乎至今也没有完全停息下来。无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到处都还能看见它的余波,听到它的回响。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世俗化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可以说功不可没。

因为语境的不同,西方的世俗化传播到中国以后,它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西方的世俗化是在反抗宗教控制的语境中滋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去宗教化。中国的世俗化则是为了摆脱政治束缚而兴起的,所以去政治化便成了它的主要诉求。尽管西方的世俗化与中国的世俗化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呼唤人性的回归。众所周知,人性对文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人性开

掘的深浅,直接关系到文学性的强弱。然而,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都曾不同程度地限制甚至扼杀了人性,从而干扰和阻碍了文学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世俗化思潮无疑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文学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作家的立场。或者说,文学的价值是否纯粹关键在于作家的立场是否纯正。回眸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作家的立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够纯正的。作家的立场总是受到政治的左右,紧贴政治甚至附属于政治,实际上就是政治立场。从“土改”到“反右”,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作家们几乎都是从政治立场出发,用文学为政治服务。虽然作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政治立场显然不是纯正的作家立场。纯正的作家立场是什么立场?我认为,是人性立场。作家应该站在人性的高度,超越政治,从人性的视角,用人性的目光,去观察、发现、捕捉那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不易为一般人察觉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那往往是人性中最温柔的、最脆弱的、最潮湿的、最疼痛的、最神秘的、最美妙的、也是最有文学性的部分。一个作家,只有从纯正的人性立场出发,才可能创作出具有纯粹的文学价值的作品来。

然而,由于极“左”思想的控制与打压,中国作家一直不敢正视人性,甚至还刻意回避人性,视人性为洪水猛兽,对人性讳莫如深。这样一来,文学就完全变成了政治的说明书和宣传单,既无灵魂也无血肉,显得虚假、干瘪、枯燥、僵硬、乏味,毫无文学性可言。“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建设。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萌芽也应运而生。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学似乎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它们如雨后春笋,竞相涌现,文坛一下子热闹起来。但是,无论是伤痕还是反思,无论是改革还是寻根,这些文学从本质上来说都还没有彻底摆脱政治的藩篱与阴影,说到底还是从政治立场出发,表现出泛政治化的倾向,属于泛政治化的写作。

泛政治化的写作与人性无关。除了政治本身,它充其量还涉及与政治密不可分的道德与伦理。这些文学企图传达给读者的,要么是官方意志,要么是精英意识。它们选择的往往是宏大叙事,关注社会态势和时代风云,强调作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注重作品的思想性与教育性,长于表达诸如信仰、主义、价值、理想、彼岸、终极、乌托邦这类貌似重大的、深远的、崇高的主题。遗憾的是,无论是出于官方意志的写作还是出于精英意识的写作,它们都忽视了人性这个重要命题,要么用党性、要么用理性取代了人性观照,致使作品的文学性大打折扣,削弱了文学价值的纯粹性。

直到西方世俗化思潮袭来,中国作家长期以来压抑的、冻僵的、休眠的人性才得

以真正被唤醒、复苏、激活。从此,一大批敏感的作家便积极投入了这股强劲的潮流,纷纷从政治立场转向人性立场,开始了文学世俗化的探索与实践,从而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让中国文坛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经过世俗化的洗礼,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最大变化,我认为是民间意味的凸显。民间意味是相对于官方意志和精英意识而言的,它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文学动机、文学趣味及文学策略。代表官方意志的文学坚持的是党性原则,关注的是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命运,显得沉重、坚硬、宏大。当年流行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大都属于这类写作,王蒙、刘心武、蒋子龙和张贤亮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家。代表精英意识的文学坚持的是理性原则,探讨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类人生课题,显得高深、遥远、玄虚。曾经备受瞩目的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基本上属于此类,代表性作家有韩少功、张炜、阿城和张承志等。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类文学都属于泛政治化或者泛道德化的写作。代表民间意味的文学则不同,它坚持的是人性原则,反映的是平头百姓、饮食男女、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男欢女爱、七情六欲等,一切世俗生活都可以作为写作对象,显得真实、鲜活、生动、丰富、亲切、有趣,具有明显的世俗性特点。

在世俗化思潮的催生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流派:一个是新历史小说,一个是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有汪曾祺、莫言、贾平凹、杨争光、苏童等。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莫言的《红高粱》、《高粱酒》,贾平凹的《五魁》、《美穴地》,杨争光的《赌徒》、《黑风景》,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等都是新历史小说的经典作品。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有余华、刘震云、方方、池莉等。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刘震云的《新兵连》、《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桃花灿烂》,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均是新写实小说的重要收获。无论是新历史派作家,还是新写实派作家,尽管他们所描写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内容不尽一样,但他们的小说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有意摆脱了官方意志的束缚和精英意识的笼罩,自觉地回到了文学的人性立场,凸显了文学的民间意味。

民间意味是文学世俗化的本质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取材的生活化。它让文学回到了世俗生活本身,包括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强调生活的客观性、生动性和丰富性,一方面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的题材领域,另一方面有效地拉近了文学与生活的距离。二是立意的人本化。它坚持以人为本,把人作为文学关注的焦点,超越政治和道德,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人、分析人、透视人,着力写人心、写人情、写人性,不仅强化了文学的人学内涵,而且深化了文学的人性主题。三是表达的感性化。它崇尚感性美学,注重感觉和体验,在形式上全面借鉴了民间文学的叙事策略,加强

了文学的形象性、趣味性和可感性。正是因为民间意味的凸显,中国当代文学焕发出了令人欣喜的活力与魅力。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文学的世俗化也不例外。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文学世俗化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看到它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因为世俗化思潮的泛滥,中国20世纪末的文坛上曾一度出现了两种不好的创作倾向:一种是缺乏理性的社会化写作,另一种是缺乏美感的身体化写作。这两种写作都可以看作世俗化思潮对文学的负面冲击。

社会化写作的典型代表,应该是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那一批作家和作品,像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前年后》等。他们紧跟时代步伐,快速反映社会现实,作品虽然具有可贵的社会勇气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但是他们往往照搬现实,堆砌生活,只注意到了对形而下的现实图景和生活状态作纪实性的描写,缺乏形而上的提炼与思考,给读者一种复制现实和展览生活的感觉,严重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身体化写作的代表人物,无疑首推那批倡导下半身写作的作家,如卫慧和棉棉,卫慧的《上海宝贝》、《像卫慧一样疯狂》和棉棉的《糖》、《盐酸情人》都是这方面的标志性作品。她们高举欲望的大旗,赤裸裸地写性,器官、上床、高潮、尖叫等是她们的作品中的关键词。这种写作虽然大胆地冲破了人性的禁区,直面肉身,正视欲望,写出了许多与性有关的独特体验,但是,她们过度地痴迷于性本身,为写性而写性,缺乏节制,缺乏收敛,更缺乏审美观照,致使作品失去了文学应有的美感。

不过,我们不能因为上述两种写作倾向的出现而全盘否定文学世俗化的成就。客观而论,它的功是主要的,过是次要的,功大于过。而且,令人欣喜的是,有一批敏锐的作家,他们及时发现了文学世俗化的种种弊端,在顺应文学世俗化的同时,也开始了世俗文学化的探索。比如鬼子和东西,他们也客观冷静地描写社会现实,努力展现原生态般的生活况味,如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和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他们不再是简单地纪实,而是将理性之光照进了现实之中,让作品走出了社会化写作的纪实泥淖,既有形而下的感性描写,又有形而上的理性提升,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交融,从而强化了作品的文学性。再如迟子建和铁凝,她们也把性和欲望作为重要的写作对象,如迟子建的《逆行精灵》和铁凝的《麦秸垛》,这些作品都坦然地、正面地写到了性和欲望,可她们却刻意回避了性所带来的感官刺激,注重的是性给人们带来的情感体验,极力发现性本能中所蕴藏的美感心理,从而让作品走出了身体化写作的欲望深渊,达到了情感与美感的交融,极大地彰显了文学的无限丰富性和多种可能性。

(晓苏,武汉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祛魅与返魅：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世俗化向度

戴海光

“世俗化”在中国是一个与“政治化”相对的概念，其关注点为个体世俗生活与个人欲望，而非带有“集体”性质的民族国家及社会秩序。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世俗化思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愈演愈烈，这导致理想主义时代文学书写力求内容“宏大”、精神“崇高”的美学规范“祛魅”，文学“返魅”到自然状态，作家转向对凡人世俗生活的叙写。

一、祛魅：解构“崇高”

早在春秋时，孔子就提出了“兴、观、群、怨”的观点，这是对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功用的经典阐释。孔子的观点影响了后世的文学价值建构，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文学都肩负着教化职能，然而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变革，各种西方文化趁机输入中国，形成与既有文化形态话语相抗衡的格局，这样原有“一元”文化价值体系的话语权被削弱，西方话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在价值观念的转型期，文学价值话语诉求向度发生了变化。从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价值诉求看，它呈现出明显的“去‘集体话语’而趋‘个人话语’”、“远‘崇高’而近‘鄙俗’”的价值祛魅倾向。

一是去“集体话语”而趋“个人话语”。强调文学“集体话语”的表达，是作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如五四“启蒙文学”、“十七年”文学及80年代初的“启蒙”文学，都表现出明显的“集体话语”特征。可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世俗化导致了“集体话语”叙事的大撤退，而具有“个人话语”特征的文学叙事则成为发展主流。“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变，使文学的艺术审美、思想价值表现出了新特征：作家们不再考虑文学的价值重构与宏大意义阐释的功能，文学回归到自然本体而更重视对“个体”生命体验的书写。这与“集体话语”时代文学的价值诉求是相悖的。如果说表现个体生命是具有“个人话语”性质的文学表现的一个维度，那么将传统文学中的“英雄”拉下神坛并赋予他们“常人”特征则是“个人话语”体现的另一个维度。大家知道，在政治革命意识高扬的年代，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都具有“高大全”形象，而在世俗化时代的小说中，如葛翎（《大墙下的红玉兰》）、彭其（《将军吟》）、王公伯（《神圣的使命》）等英雄人物在面对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时，既有个人理想与集体理想斗争的痛苦，又

有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的困惑。这祛除了英雄人物的“传奇”品格,使之还原成世俗化的凡人,这是文学去“英雄”化的体现。

二是远“崇高”而近“鄙俗”。优秀文学作品总能给人以震撼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源自文学“崇高”之美。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中,“崇高的特点不但是美,它的特点同样还是自己的特殊威力。崇高的范畴反映生活现象和艺术现象的这么一种内容,它使人感觉到高临在平庸和渺小之上,促使人去和卑鄙进行斗争”^①。多少年来,正是作家们执着于对文学“崇高”之美的建构,才使作品在经历诸多风雨后,仍能给人以向上、向善的力量。然而,8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后,作家本应恪守的文学“崇高”传统,逐渐被抛弃,文学从整体上远离了“崇高”,滑入到“鄙俗”的艺术建构中。如在“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文学中,就呈现出很鲜明的解构“政治”神圣化倾向。如果说该倾向是解构“崇高”的个人尝试,那么“新写实”与王朔小说里表现出的消解“崇高”的实践则是作家们的“集体”行动。新写实小说没有将既有价值观念强加在人物之上,也无图解主流话语的意向,而以一种近乎“零度情感”的话语表达方式,对普通人的琐碎、庸俗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描绘。在王朔的小说中,作者在叙述中呈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狂欢姿态。可见,不管是新写实小说还是王朔的小说,它们都不再追求预设、虚妄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更强调活在现实的世俗人生,显然这与文学应坚守“崇高”的价值诉求是背道而驰的。而在新生代、新新人类的小说中,文学“崇高”之美更是被解构得体无完肤,文学不再关涉伦理、道德诉求,从而“叙事成为物质符号的堆砌……勾起消费欲望的商品……文本成了欲望无节制表演的场所”^②。这些作品抹去了现实生活的丰富性、诗意性,以感官刺激、娱乐快感取代了文学的审美性、崇高性,表现出宣扬虚无、颓废的人生享乐思想的动机,这是作家解构“崇高”的极端表现。

二、返魅:回归日常

文学世俗化在当代中国经历了较长的演变过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世俗化作为一股思想潜流”^③就初见端倪,作家们打破了“十七年”、“文革”文学的写作观念模式,开始重视凡人生活的描绘。这大致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作品表现出来。在《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中,作品叙

① [苏]万斯洛夫、特罗菲莫夫:《美与崇高》,夜澄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39页。

② 李长中:《20世纪中国文学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语境与价值缺失》,《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2期。

③ 樊星:《论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世俗化思潮的演化》,《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写了卑微人物的悲剧人生,控诉了“左倾”错误给人造成的创伤。与“伤痕文学”相比,《李顺大造屋》、《人生》等“反思文学”作品虽然关注的仍是底层人物,但是已不再拘泥于对其苦难的呈现,而是从人性高度反思了苦难根源。《乔厂长上任记》等“改革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些敢于担当的城乡改革者的形象,然而作者祛除了人物的“神性”光环,将他们视为有喜怒哀乐的凡人。如果说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作者们出于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回应的考虑而使世俗化表现程度欠深入,那么“寻根文学”和“市井小说”则代表了一种更深入的世俗化书写范式。在这些小说里,作者们刻画了一些底层农民、市民形象,描绘出一幅平淡的底层民众的生活图景。

不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描绘出一幅幅个体生活图景,表达了个体世俗欲望的合法性,显示出从“集体”向“个体”之人转变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五四“人的文学”传统。然而这些作品是刚跳出政治藩篱的“新生儿”,其叙事话语还保留了政治意义指涉的痕迹。因此,还不能称它们为严格意义上的世俗化文学作品,只到新写实小说兴起,才标志着文学世俗化时代的真正到来。新写实小说是一种具有“艺术自觉”性质的小说形态。从视角看,新写实作家以“平视”视角与人物进行“对话”;从内容看,新写实小说热衷于描绘普通人的“原生态”生命形式和表达他们世俗的欲望。比如,池莉的小说“人生三部曲”再现了饱受酸甜苦辣又庸庸碌碌的底层市民生活,而《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叙写了售货员猫子、公交司机燕华等小市民的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诠释了“活在世俗当下”的人生主题。方方的《风景》里没有优美“风景”,只有一幅幅底层民众窘困不堪的生活“风景”。如果说池莉、方方的小说着眼于表现小市民的生活图景,那么刘震云的小说则将触角伸向了“单位”这个特殊场域,《单位》、《一地鸡毛》等小说描绘了单位复杂的权力生态及主人公小林不堪重负的生活镜像。

新写实小说再现了凡人的生活状态,叙述了小人物庸俗的人生体验。虽然这种表现方式解构了生活“诗意”,但是却迎合了欲望化社会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从而掀起了一股解构“崇高”、表现“世俗”的写作浪潮。这股浪潮也影响了其他作家的创作,王朔即是一个典型个案。其《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等小说,实现了“雅与俗、沉重与洒脱、愤世与玩世各种矛盾因素的有机融合”,使“一大批在现世生活的沉重而寻求解脱、玩得潇洒而渴望理解、玩世不恭却又满怀忧患的各色人等沉醉在他的文本世界中,在亵渎中寻求快乐”^①,王朔以这种玩世不恭的写作态度用调侃、戏谑的语言展现

^① 李扬:《亵渎与逍遥:小说境况一种——王朔小说剖析》,《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3期。

了凡人的世俗生活,迎合了世俗文化消费心理,从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

不可否认,新写实小说与王朔的小说,都肯定了“世俗”的合理性。然而它们“没有为了肯定世俗而否定‘神圣’……对于世俗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过去过于被强调的‘神圣’、‘终极’、‘净化’文学的一种矫枉过正而已”^①。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介入,原有“一元”文化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式微,加之受“后现代”文化思潮蛊惑,新生代、新新人类作家改变了以往作家确立的文学“世俗化”的“路线图”,在小说中表现出去“世俗”而趋“鄙俗”的倾向,何顿的《生活无罪》、张旻的《情戒》、朱文的《我爱美元》、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及卫慧的《像卫慧那样疯狂》、棉棉的《啦啦啦》等小说即是这种倾向的体现。它们展示了底层普通市民卑琐的生活状态与异化的生命形式,特别是在卫慧、棉棉的小说中,满足或发泄欲望成了人物个体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从而“酒吧、迪厅、咖啡吧等成为他们纵情享乐的朝阳之地,浴缸、马桶、电话线旁等成为他们随时疯狂淫乱的温床”^②。这种文学“鄙俗化”书写本已不堪入目,然而随着世俗化进程的推进,文学“鄙俗化”表达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诸如春树、木子美之流的“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的横空出世,则完全偏离了“身体写作”的初衷,致使文学滑入“鄙俗化”的深渊。

(戴海光,武汉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

“世俗化鲁迅”的得与失

禹权恒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世俗化思潮”在诸多社会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针对鲁迅研究而言,“世俗化思潮”堪称一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鲁迅研究的固有路径,鲁迅形象因此也遭遇了一种妖魔化改写。

1993年,《上海文学》第6期刊登了王晓明等人对话形式的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正式开启了全国范围内“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论争序幕。《读书》、《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作家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或辟出专栏,或刊出连续性对话文章,围绕着“人文精神”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著名

① 李长中:《20世纪中国文学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语境与价值缺失》,《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2期。

② 欧阳小勇:《“意义”的消解及“性而上”的迷失——关于卫慧、棉棉等“七十年代后”作家及其写作的思考》,《学术探索》2004年第5期。